

简论中国应用史学的先秦实践

朱季康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 先秦是中国史学产生的时代,也是应用史学大放异彩的时代。先秦应用史学经历了以僭“天命”为依托的史政不分;以冒“礼”为依托的史官职能专业化;以“仁”、“霸”为依托的实际应用等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天命为经、以礼为纬,以仁、霸为节的应用史学实践体系。中国应用史学的先秦实践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 先秦;应用史学;实践体系;天命

中图分类号: K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41(2010)02-0164-05

分析的历史哲学提出一个启迪,历史学是依靠科学与人文两条腿前进的学科。基础研究与现实应用永远是其跋涉旅途中划动的双桨。凡以实现史学研究的应用价值为直接任务和服务社会现实需要为目的的历史研究实践及其相关成果的总和,大致为应用史学的最好界定之一。中国史学自滥觞于先秦起,即翻滚着应用史学的鸿涛。

拿着殷商甲骨、西周金文乃至“史官”的设置等出生证明的中国史学,出于现实需要,选择应用作为其主修课程。无论是王阳明的“五经皆史”,还是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后人所以为的先秦大部分文化著作皆为这门主修课程的作业。《诗经》言:“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1]大雅·荡}史学的应用价值被广而告之,研究者们也因此而自重。《春秋》以鲁正史的身份,“拨乱世,反之正”。司马迁评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2]第130卷}孔子的“述而不作”乃是自谦之语。这股反映当代历史并急功近利使之应用的冲动刺激着先秦史学的发育。

一、先秦应用史学的发育演变

先秦应用史学的发育演变经过了上古殷商、西周至春秋中期与春秋晚期至战国阶段,各阶段表现与内涵如下。

(一)殷商:以僭“天命”为依托的史政不分阶段

上古时期,史学研究主体的“史”,其职能与“巫”同,是巫祝的一部分,至殷商时期始与“巫”有所分化,分化的时间下限大致不晚于西周初。殷商则为其过渡时期,表

现是“史”开始具备记事和记言的功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3]玉藻}

王国维推崇殷商之“史”:“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4]卷6,释史}刘师培更加直接:“盖古代之尊史官,非尊其官也,尊学术耳。古代学术以天文术数为大宗,而天文术数亦掌于史官,此史官所由尊也。”^{[5]7}掌握着天文术数奥妙的“史”享受着与“巫”平起平坐的特权。《史通》引《吕氏春秋》语云:“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挚见纣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6]史官·建置}说明“史”另有保管图籍、献书规谏的职守。殷商“史”的责任主要为沟通“天”与人的联系,喻谏统治者顺“天道”做事,统一人们意志于“天命”安排。“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7]万章上}在祭祀与征伐为主要政治活动的时代,违背“史”所转达的“天命”意旨是会遭天谴的。这种群体意识的思维桎梏赋予“史”以相当大的政治权利,可通过“天命”来“规范”统治者的行动,左右王权。史、政不分被视为合理的存在。

该阶段,襁褓中的中国史学除了“史”们无意识的实践活动外,无法为我们提供科学意义上的史学理论,处于原始宗教活动状态的“史”们,囿于其职能的无拘束的自然状态,尚不具备主观创建系统史学理论的理想与条件。

视“史”的政治行为为其应用史学实践的看法,过于简单。然这些行为在相当程度上离不开主观因素的发挥,即使天象与卜辞是如何的“精确”与客观,他们也是在

* 收稿日期:2009-04-20

作者简介:朱季康(1979-),男,江苏扬州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

“史”的解释下为政治服务的。该阶段一些“史”，如史墨、史赵等既是史学家，也是政治家，控制着远较后期史家丰富的政治资源。

（二）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冒“礼”为依托的史官职能专业化阶段

“殷革革命”使西周统治者震惊于“天命靡常”的同时，认识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8]有语、“宜鉴于殷，骏命不易”^[1]大雅·文王的道理。开始审视“天命”之外的力量，从过去的人类实践中找寻能左右社会发展的力量与启示，产生了有意识地研究历史的需求。作为“天命”与人类间纽带的“史”开始向史官职能专业化转变，真正意义的史官出现了。

走下神坛的史官依旧位高权重。“王前巫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3]礼运 其时的史官，有大（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女史、御史等称谓，如老子曾任周朝的柱下史与守藏史。史官的记言记行内容含即位、册命、盟誓、吊问、征伐、朝觐、筑城等，繁杂而丰富。凡有仪式的活动几乎皆有史官的参与。除天子有史官外，诸侯乃至卿大夫也各有史官，“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记，无国不记。”^[9]鲁公七年

“当人们以人的意义取代神的意义，就有了最初的历史学。”^[10]该阶段，应用史学扯上了“礼”这张大虎皮。周初，周公“制礼作乐”，以“礼”作为统治规范。春秋初，“礼崩乐坏”，各诸侯、大夫僭礼行径层出不穷。应用史学在作史中秉持“礼”的宗旨，以达到以史“维礼”、“复礼”的目的。这种批判现实的应用史学的最大特征就是形成了盛行一时的号为“春秋笔法”的作史风格。《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学术界尚存争议。但以所谓“春秋笔法”统领那个时代的史学语言，并不为过。《春秋》就是该阶段一部应用史学的流行教科书。

这部教科书开启了中国历史资治的应用风气。“春秋笔法”以“常事不书”与“讳书”为原则。“常事不书”含常事与非常事不载。常事不书符合史学著述惯例，但非常事不书则是作史者有意回避一些僭“礼”的史实。讳书则“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11]2210，“为尊者讳，为贤者讳”^[11]2244。《左传》评价其“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怨恶而扬善”^[12]370。杜预进一步解释：“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避、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怨恶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齐书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13]有学者以为“春秋笔法”的创造是囿于当时书写载体的限制，或为文辞所要求。刘知几《史通》称“《春秋》变体，其言贵于

省文”^[14]168。章学诚以“古人作书，漆文竹简，或着缣帛，或以刀削，繁重不胜”说明“文不得不省，辞不得不约”^[15]163。然笔者不敢苟同，《尚书》、《诗经》尚有完整的长篇，《春秋》数百年间只言片语，甚至不如铜鼎铭文详细，非物质因素限制，实是先秦应用史学的时代话语。

该阶段，天道依旧是笼罩在应用史学头顶的“紧箍咒”。老子谈愚民，以古为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分析“民之难治”的原因在于“以其智多”，从而提醒现实统治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16]第65章。鬼谷子指出：“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此。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复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17]反应 还提到：“奥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17]捭阖 但催动“紧箍咒”的咒符中已经蕴涵着人的话语，应用史学对在历史中作用的关注比重明显增加。

（三）春秋中期至战国：主要以行“仁”、“霸”为依托的实际应用阶段

春秋中期开始，社会发展进程出现重大变革，旧礼法制度开始崩溃。人类在社会观念上更加注重自身的社会作用与价值，逐渐淡漠神灵与命运的安排，从而推动应用史学的实践到了一个新阶段。

该阶段，诸子百家之说由兴起至轰烈。转徙于诸侯，折冲于尊俎，巧言令舌，天花乱坠，这是百家之士的擅长。若无客观历史，百家论据将成无本之源。这些“士”不自觉地与“史家”相融合，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征途中，以应用史学为敲门砖。因而诸子学术更多的被当作思想来看待，而不是死板地对历史的复述。儒家的“仁政”、“恕道”；孟子的朴素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等等，很大程度上是以史为借鉴而加以传播的。这种直接借鉴的实际应用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也为后世所罕见。

在应用史学观上，战国时期的“士”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中积极的较少，消极的较多。韩非子的“圣人期修古，不法常可”^[18]五蠹，就充分肯定了历史发展的进步意义。其余诸子，尤其以儒家为主，更多的则是强调社会发展的轮回。

论政时，列子评价管夷吾助齐桓成霸一事及管夷吾、鲍叔牙两人友谊之情：“此世称管、鲍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实无善交，实无用能也。实无善交实无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鲍叔非能举贤，不是不举；小白非能用仇，不得不用。”^[19]力命 提醒国君用人察事应顺应大局。申子以“昔者尧之治天下

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揭示“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20]大体告诫君臣名分的重要。庄子为了说明“能尊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的道理,举例:“大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谓能尊者矣。”批判当今统治者“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其身,岂不惑哉!”^[21]杂篇·让王·第二十八 墨子则用“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岛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闾天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22]尚贤的史实,力推“尚贤”之说。韩非子以“文王说纣而纣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缚;而曹羁奔陈;伯里子道乞;傅说转鬻;孙子臆脚于魏;吴起收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卒枝解于楚;公叔痤言国器反为悖,公孙鞅奔秦;关龙逢斩;苾弘分脰;尹子阱于棘;司马子期死而浮于江;田明辜射;宓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陈于市;宰予不免于田常;范雎折肋于魏”为例,说明“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非贤圣莫能听”^[18]难言的道理,鼓励君主从谏如流之道。他以“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18]委臣之理喻诫君主用人与爱臣之术。

评社会风气,荀子提炼前代“仕士”标准:“古之所谓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还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与此相反,“今之所谓仕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仪而唯权执之嗜者也。……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恇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23]墨子以古人为民食、衣、住、行、色等五事的必要来反驳今日奢华之风,认为:“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以俭节也,小人之所以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22]辞过

谈军事征伐,墨子提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情欲誉之审,赏罚之当,刑政之不过失”。他假人以“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之扩地收众设问,以陈、蔡、吴等国之败为回应,倡其“非攻”之说^[22]非攻。齐宣王就灭燕遭诸侯反对一事问政孟子,后者以汤旧事举例:“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批评齐王的灭燕政策。要求:“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以避诸侯围攻^[7]梁惠王章句下。

二、先秦应用史学的实践体系

先秦应用史学的实践体系可略分如下:

(一)天命为经

“究天人之际”的易学成为统摄先秦哲学、具有当时文化法典性质的学问。遵循的是一种统贯天人的整体思维,其八卦、阴阳、五行等命题都根植于经验思维。这种思维把世界的统一性看作是一个自然之理,着重于探索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其价值理想是追求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易学全部努力的理想是探询天命所在,探询天道与人的关系,依旧未脱天命窠臼。如果我们承认先秦存在初具雏形的史学思想,那么天命观当勉为其难。这种先秦史学最初期的的指导思想也是先秦应用史学实践体系中的经。

(二)礼为纬

柳诒徵曾评价:“总(周)五史之职,详析其性质,盖有八类。执礼一也,掌法二也,授时三也,典藏四也,策命五也,正名六也,书事七也,考察八也,归纳于一则曰礼。五史皆属春官宗伯。春官为典礼之官,即尧典之秩宗。伯夷以史官典二礼,其职尤简。故宗伯与史不分二职。历夏商至周,而政务益繁,典册益富,礼法益多,命令益夥,其职不得不分。然礼由史掌,而史出于礼,则命官之意,初无所殊。”^[24]²²⁸ 先秦史学与礼“缘真”而“意切”,“缘真”者:在礼的形成、制定、传播、解释等过程中,先秦史官的功劳最著,可以说,无史官的努力,即无礼。而制礼后,其所蕴涵的文化纪律与规范则通过史官与后来的研究历史者而得以表现与传承。“意切”者:孔子从礼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对后世影响极大。他们将历史看作是礼的变更,希望通过“复礼”,而达到“继周”的现实,从而“百世可知也”。因而先秦史官及历史研究者都有着对礼制的强烈坚持。“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9]昭公二年是先秦应用史的目标之一。针对具体的史实,先秦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承认有此史实,齐王追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便通过自己的需要对历史进行了理解,云:“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7]梁惠王章句下 巧妙地回避了汤与武王僭礼的问题。

(三)仁、霸为节

春秋后期与战国时期,仁与霸的命题成为诸子百家的主要争论兴奋点,也是诸子运用应用史学所要达到的不同目标。齐宣王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7]梁惠王章句上 委婉的表达了儒家倡“仁”的思想。孔子不载“齐桓晋文之事”,回避霸道,也是孔子有意识的应用史学实践。由“仁”引申出的民本思想是先秦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民治认识。他们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尽心章句下 之类的结论,要求统治者以仁治民。孟子以“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嫠,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来回答齐宣王“王政可得闻与?”用“公刘好货”、“大王好色,爱厥妃”^[7]梁惠王章句下 却与齐宣王的“好货”、“好色”之不同来勉励其行仁政,与民生息,与民同好。而以韩非子等为代表的尚法一派也大张旗鼓实践应用史学。如韩非子以荆庄、齐桓、燕襄、魏安厘等史迹来说明“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8]有度。

以天命、礼为经纬,以仁、霸为节的先秦应用史学实践体系,是当时的特殊历史生态所决定的。

生产力水平低下,为温饱而奋斗的人类慑服于气象变迁、自然灾害等无法理解与驾驭的自然现象,故对天命的关注成为史学的重点。简单的生产生活使应用史学的用武之地局限于“祀与戎”。载体的落后与稀少使文化传播的步伐十分缓慢,文化成为稀缺资源为少部分人垄断。即使孔子提倡“教无类”,诸子昌盛时期,能受文化教育的也仅是人类中的凤毛麟角。礼并不为全部诸侯与士大夫知悉,甚至号称“礼在鲁”的鲁国君臣出会他国时,曾仓皇不知礼节所对。在向封建制逐渐过渡的所谓“礼崩乐坏”时期,礼成为维系传统社会秩序与恢复美好未来的希望所系,因而得到了史学研究的高度推崇。国与国之间兼并的激烈与残酷战争的现实,使得仁与霸的争论步下学术的圣殿,披挂着历史经验的盔甲融入诸子百家的口水之中。

三、先秦应用史学实践的历史价值

先秦应用史学的实践对儒学发展与中国史学传统影响巨大,也为后人留下种种警示。

(一)应用史学与儒学的结合

先秦时期,是史学与儒学两个巨人互相影响、发育的时期。襁褓中的史学面貌类似儒家,甚至有时期出现儒史不分的状况。由于史官对礼的坚持,有人曾评述中国传统文化部分可理解成“史官文化”。而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也是在史学的润泽下得以丰满。从客观

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先秦儒家皆是史家,此言非悖。也有人将史家看作诸子百家的一支,认为史家是独立于儒家之外的学派,即如此划分,也不可否认史家与儒家的紧密联系。《春秋》、《左传》等即为儒家经典,也为史学著作。

先秦应用史学与儒学的默契在于礼制与仁的理念。基于维持与恢复礼制的同一出发点,儒学注重运用先秦应用史学发扬其“仁”的观念。“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完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7]离娄上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7]离娄上 对礼的维护和对仁之理念的宣传需要是儒家研究历史的原动力。

先秦应用史的实践既是先秦儒学的内容之一,也是儒学发展光大的法宝。《春秋》等著作的流芳百世为儒家理念的传扬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丢掉了应用史学这把利刃,先秦儒家将陷入赤手空拳的窘境。正是先秦时期的蜜月合作使得儒家在后来的发展中从不愿舍弃这把锐利的武器。

(二)先秦史学为中国史学奠定应用传统

应用史学这门主修课程的精彩与奇妙深深地映入了出生不久的中国史学大脑中。

先秦应用史学为史学开创了“借事明义”的修史方法。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意义则丘窃取之矣。”^[7]离娄下 这种手法完全是应用性的,记史以达义,给后世的史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惯性。

先秦应用史学从一开始就强化了史学的社会教育功能。《左传》针对昭公三十一年“黑肱以滥来奔。”评论道:“名之不可不惧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己。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彰,惩不义也。”^[9]昭公三十一年 青史留美名或恶名在相当程度上对现实人物有警戒作用。而史学著作所表达的鉴古讽今也对现实社会风气有巨大的改良作用,“以其善行,以其恶戒”^[25]晋语,“为之耸善而抑恶”^[25]楚语上,并因此“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9]昭公二十三年。历史研究也因此具有训导教育的功能。

(三)先秦应用史学实践的缺陷与经验

襁褓中的先秦应用史存在着先天性病因,在后世的某些阶段时有发作。

首先是历史观的不科学性。有人评价,先秦史学没有历史观,只存在所谓的“春秋史观”^[26]。先秦史学盛行“托古”之风,“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

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27]通过托古,针砭时政,这是先秦史学应用实践的主要内容。但无论是殷商周的史官,还是诸子百家,在对史实的应用过程中随意性过强,先秦史学的应用实践中随处可见“影射史学”的痕迹。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矛盾不复杂、文化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样不科学的史观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不突出,但是到了后世,其影响则十分恶劣,文革即为这种先天性疾病最近的一次复发,其恶果时刻提醒史学研究者要切实补上应用史学理论建设这一课。

其次是基础史学研究的缺失使应用史学实践受到相当限制。

基础史学研究的薄弱是先秦史学的大弊。《春秋》严格来说不能称作一部合格的基础史学成果,它应是一部应用史学的著作,太多的刻削痕迹歪曲了真实历史。因而称整个先秦时期没有一部整体的基础史学研究著作并不为过。“春秋笔法”所带动的史学话语造成了基础史学研究在那个时代的缺失。史官与士所联合的史学研究力量所堆砌的史学积累是如此单薄,无论是研究的指导思想、方法乃至应用实践,都是自发状态的原始研究,较后世幼稚与简单。应用的根基不牢,导致其应用的范围与层次较低,技术不精确。先秦应用史学主要涉及范围为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而几乎没有涉及社会史等方面,这是当时的史学生态所决定的,这也是基础史学研究薄弱的伏笔之一。在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的应用实践尚且出现如此缺陷的情况下,社会史的应用较其更为复杂,先秦史学研究者还未能掌握这项技术。

回顾先秦应用史学的实践,这是一个滥觞缤纷的时代,创造了独特的史学生态,也是应用历史学走向理想状态的先声。

参考文献:

[1] 诗经[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2] (西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 崔高维校点. 礼记[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 [4] 王国维. 观堂集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 陈桐生. 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 [6] (唐)刘知几. 史通[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 [7] 孟子[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 [8] 尚书[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 [9] (春秋)左丘明. 左传[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 [10] 杨豫,等. 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1] [清]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2] 杨波峻校点.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3] (晋)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序[M]. 北京:学部图书局刻本,宣统二年.
- [14] (唐)刘知几. 史通通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15] 钱钟书. 管锥篇(第1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6] (春秋)老子. 道德经[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 [17] (春秋)鬼谷子. 鬼谷子[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 [18] (战国)韩非子. 韩非子新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9] (战国)列御寇. 列子[M]. 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
- [20] 张觉点校. 商君书·韩非子(附录1)·申子[C]. 长沙:岳麓书社,1990.
- [21] (战国)庄子. 庄子[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22] (战国)墨翟. 墨子[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3] (战国)荀况. 荀子[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4] 柳成符,柳定生. 柳诒徵史学论文集[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25] (春秋)左丘明. 国语[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85.
- [26] 雷戈. 史观考——试论中国古代“历史观的空白”[J]. 学术月刊,2001(5):65-74.
- [27] 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责任编辑 张颖超

Practice of Chinese Applied History in the Pre-Qin Period

ZHU Ji-Ka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China)

Abstract: The Pre-Qin Period was the time when the Chinese history came into being, and the time when applied history prevailed. At that time, applied history experienced the three stages of non-division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specialization of history officials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us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system is formed with destiny, the ritual, the kernel, the tyrant as the principal element. The practice of applied history in the Pre-Qin Dynasty exerted great effect on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applied history; the Pre-Qin Period